

导 言

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地球运转到二十世纪末，一个严肃而现实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国的文明主体面前：如何通过现代化来摆脱中国的落后？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将起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它不仅不能指导中国的现代化，甚至还会起障碍作用。我们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虽然是近代的产物，但它的科学性和超前性，使其基本原则和方法，依然对世界的现代化，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现代化具有指导意义。这种指导意义，并不是教条主义者所能理解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只能有两点，要么是全部照搬，要么是弃之不用。应该采取的态度则是从国情出发，经过切实而科学的创造性思维，使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在解决现实社会矛盾中具体化，即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本身就是理论的创造，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和原则。而中国的现代化，又必将进一步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使之在现代条件下得以发展。

一、“振兴中华”百余年的夙愿

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台北；不论是长江流经的土田，还是长城盘踞的群山 不论是热闹的都市 还是偏僻的乡村 不论政治家、思想家 还是工人、农民 不论留洋的学者 还是“土包子”乃至已入外国籍的华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但凡属于中华民族的人们——他们占人类总数的近四分之一——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振兴中华！

振兴中华 这是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那种旧有的优越感被‘洋人’的先进武器击败 进而又不得不折服西洋、东洋来的近代文明，并开始意识到自己明显的衰落以后，由先进分子所提出的奋斗目标。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 到孙中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 其根本目的 都在于此。振兴中华 是人类中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最大的民族的百余年的夙愿。

我常问自己 也在课堂问我的学生 中国是什么 它存在哪里？

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中国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它存在于地球的东半部——任何一个有小学文化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从地图或地球仪上找到它！

可是 我还坚持问 中国是什么 它在哪里？……一遍又一遍，不仅被问者答不上来了，连我自己也说不清了。

看来 这又是一个“熟知而非真知”的问题。黑格尔这位“哲学之王”，正是从这个熟知与真知的命题开始他的辩证逻辑研究，并实破了传统形式逻辑的定论的。而我们这套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系列专著，也要从这个似乎所有中国人都熟知——熟知到不必去思索它的程度——但并非真知的问题，开始我们的探索。

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以“夷”字来称呼外国人的，带有明显的蔑视之意，而最擅长使用文字的中国人用‘洋人’这一词时 别有一番意味。

中国，首先是个地理的存在，它是中华民族得以衍生之所，在这块土地上，繁育着历代的华夏子孙。中国，又是一个历史的存在，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五千年的文明史，演出了多少政治、军事的大剧，而承载这些政治、军事活动的，又是那些平凡、甚至庸俗的经济运动，它们的综合，就构成历史，它又分为若干个特殊的时代，并逐步向着文明发达而前行。中国，又是一个力量的存在，它的人口、经济、政治和军事，形成了总和的社会力量，不仅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是与地球上其他国家发生关系的基础，国与国之间，似乎是一个大的力场，相互吸引和排斥，中国国力如何，决定了它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还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正是由于它特定的价值观和思想道德，才维系着世代延续的中华民族，才使今天 12 亿多中国人在地球的任何角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中国的发展轨道，也就由它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而做出界定，并将在发展中，进一步繁荣中国的文化。

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的，是我们的祖先留给了我们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正是我们的祖先，以他们的努力、勤劳和智慧，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同样值得我们自责的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的这种作用越来越小，以至于我们这个有 12 亿人口大国的领导者们，不得不反复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这只是‘落后’的体面的表述方式。

中国的落后，大约自明朝始。当以孔子和其他诸子百家发起的中国文化，经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代表的历朝历代的演进，已经成为世界文明中最为先进的一部分，不仅中国的周边国家纷纷效法，连远在西方的欧洲也意识到，必须学习中国文明。正在此时，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大举进攻中原，并向欧洲挺进。这场以骑兵——当时堪称最有战斗力的兵种——为主的征伐，一方面将中国文明拉向后退，另一方面又给落后于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欧洲人，带去了先进的中国文明。这是其随后‘中国熟’和‘全盘华化’思潮

的必要前提。而当汉族人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斗争之后，终于又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政权——明王朝 即新的封建官僚政治的同时 又不惜花大力气，派出宦官郑和，率领当时人类所能建造的最大舰队，远航西洋，做了几次辉煌但无任何实际效益的政治广告。而此时的欧洲人，则以其小得多的船队，开始了为发展商业的远洋探险。也正是这两种目的不同的远航，表现出了中国与欧洲的差距，表明了曾经先进的中国文明的衰落，以及曾一度停滞不前的欧洲文明的兴起。

由明至清 中国文明又经受了发展中的一大阻碍 满族贵族以更为落后的文化和暴力，再一次入主中原，从而巩固了在他们看来还是先进的官僚制度。当清王朝经过短暂的“中兴”之后 欧洲的岛国——英国已完成了其以加速度进行的政治和经济变革，代表资本增殖利益的英国政府，驾驭着由产业革命为技术基础而建造的新型舰艇，开始远渡重洋，到中国来开辟新的市场和殖民地。腐败透顶的清王朝，无力抵抗，由此而开始了中华民族遭受列强欺凌的百年史 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大地横行。军事、政治上的失败，标志着经济的落后，进而又危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多少有识之士惊呼：中国即将灭亡！必须奋发图强，振兴中华！

率先觉醒者是林则徐 这位钦差大臣在广东禁鸦片时 亲身体会到欧洲文明的先进性，虽然他所看到的还只是其中科技的先进——洋枪洋炮洋船比中国的武器更具杀伤力 但他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个观点，在中国的官僚阶层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 其最突出的实践 就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洋务运动”。由于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武装斗争危及了清王朝，“洋务运动”的宗旨，已非“制夷”而是“攘乱”是维护没落腐败的官僚政治。这是与历史大潮相违反的 因而也必然失败 中日甲午之战 不仅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也引发了康、梁等人的“维新变法”。这是一次大的

进步，对西方文明，中国的先进分子又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不仅其科技先进，而且生产力和管理机能都先进于中国，故而中华的振兴要引进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的。虽然这种引进还是以改良中国的封建官僚统治为目的的，但顽固而庞大的封建反动势力，仍不容许。“百日维新”的失败，迫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更上一个思想台阶。孙中山倡导革命，企图走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以此来振兴中华。然而，这条路仍然行不通。中国的封建统治，并非欧洲革命前的贵族领主制，而是比其先进一个历史阶段，且又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严密系统的官僚制。它严重地压抑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革命并没有一个足可以与官僚统治相抗衡的资产阶级来领导。虽然以武力迫使清朝小皇帝退位^①，但未真正推翻封建官僚统治，却在中国造成了一个无皇帝的纯粹的官僚统治时期，这个时期大约维持了 40 年，它的意义是使官僚政治的弊端充分暴露，并为毛泽东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对象。也正是毛泽东依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路，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必然规律，在现代人类最先进的文化指导下，真正地、全面地、彻底地动员中国人民大众，起来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振兴中华”的必要因素和条件，但中华的振兴，却不仅仅是推翻旧的政治统治，它还需要新的民主法制的建设，需要迅速发展经济，需要变革社会结构，需要文化领域的革命，需要全方位地提高文明主体的素质，而这，正是我们所要探讨的“中国现代化”。由此可见，“振兴中华”和“中国的现代化”是同一的。只有实行现代化，中国才能全面地普及、掌握、利用、发展现代文明，从而再振中华雄风，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据其应有地位，发扬其必要的先进作用。“振兴中华”是百余年中国人民奋斗的目标，而

清朝的灭亡，固然是因其为封建王朝，但它在并不强大的革命势力的冲击下，迅速垮台，一个重要因素，是民族原因。这一点，近代史学家往往忽略，以至于夸大了孙中山运动的革命性。

这一历史任务还远未完成。整个 20 世纪 可以说是中国人民以其革命斗争“ 振兴中华 ”的第一阶段 而 21 世纪 则将是“ 振兴中华 ”的更高阶段。处于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以“ 中国的现代化 ”为题 认真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 探讨下一阶段的任务 明确中国现代化的内容和途径。

二、“ 全盘西化 ”之路不通

人类 作为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 其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尚有许多不解之谜 这当然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然而 我们的研究 必须充分地注意这一个非常实际，又非常玄奥的问题：人是类的存在，不论是生存于地球上的哪个角落，他们都有其共同性，这不仅在于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也在人类相互的交往中得以表现。正是人类的共同性，才构成人类的社会，而这种共同性的首要标志 就是对先进文明的趋同。人类的发展 是参差不齐的，不仅各国、各民族的文明程度有先有后，就是本民族间，也有先进落后之别。人类对先进文明的趋同性，促使他们不断地进步。中国俗语所说的：“ 人向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表明了这种大的趋向。而人类相互间交往的面越大，交往越密切，这种趋同性及其引发的进步 也就越突出。

人类在原始状态大约生存了几百万年 彼时基本以氏族、部落为单位 各囿于一隅 交往少 故进步慢。而到近五千年时 人类中的几个大的地区 如印度、巴比伦、波斯、希腊和中国 都出现了较为先进的文明，从而使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些创造了先进文明的民族，都是在当时交通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就地散发其文明的 并未形成全球性的共同文明。而经历一段时间 有的在四、五百年，有的上千年，几大古代文明相继没落，唯有中国文明得以延续 并在世界上放其光彩。这样 通过“ 丝绸之路 ”和其他渠道 与中

国相对处于地球另一面的欧洲，在其民众不堪忍受基督教和贵族领主的统治，从内部孕育变革的时候，人类对先进文明的趋同性促使他们推崇和学习中国文明。不仅中国古代的以“四大发明”为主干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被广泛引进，而且也在吸收中国的文化和典章制度。大约自 15 世纪始 欧洲出现了“中国热”进而甚至出现了“全盘华化”论。这股热潮到 19 世纪开始降温 其原因 自然在于欧洲文明的迅速发达，而且很快就超过了依然停滞着的中国文明。“全盘华化”论从此也销声匿迹。

而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却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口号：“全盘西化”。这似乎是两个多世纪前的“全盘华化”论的回声，二者相同之处都在于人类对先进文明的趋同性，其差别则不仅在地域上 还在时代上。倡导“全盘华化”的启蒙思想家 设想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中国文化能够冲破其封建统治，而提出“全盘西化”论的中国人，则力求在中国建立近代西方的社会制度，引进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全盘西化”论在中国 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本世纪 30 年代 由陈序经提出 胡适附和。第二阶段则在 80 年代 主要是一些青年学者倡导。

陈序经在 30 年代 还是一个刚归国的留学生 他在留洋期间，写了一部《中国文化的出路》 他在书中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观点，1934 年出版，但影响不大。这个论点之所以名噪一时，原因在于 1935 年由王新命、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所引起的大辩论，陈氏在辩论中又重提其论点，因与“本位论”互相反对，始引起人的注意，尤其是当时学术界大人物胡适的附和，才成为思想界一个普遍论点，并为人所赞许或反对。陈序经的“西化”论之所以是“全盘”的 就在于主张不论经济、政治 乃至文化、伦理、文学等 都要西化 理由就在于中不如西。

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质言之 西洋文化在今

日，就是世界文化。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生活则己，要是
要了 则除了去适应这种趋势外 只有束手待毙。

胡适的认识似乎要比陈序经深沉，他写道：

“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例如中国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久而久之，自然和欧洲的基督徒不同，他自然成一个‘中国基督徒’。又如陈独秀先生的接受共产主义，我总觉得他只是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莫斯科的共产党又不同。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 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②

可见 胡适是从方法上谈“全盘西化”而陈序经则是从目的上谈“全盘西化”。虽有这些差别，但此论由之而形成。纵观 30 年代有关“全盘西化”的议论，基本点大体是从文明发展程度上谈的，虽也涉及社会制度和结构，但仅是一个次要方面。它反映了当时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然而，在官僚统治、列强欺凌之下的中国，如何实现“全盘西化”呢？这些文人学子自然谈不清楚，它只是表现了一种思想倾向，一种近乎空想的倾向。就在这场讨论还未结束时，日本帝国主义就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历史所要回答的，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如何保住中国。也正是奋力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支持，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以至于在抗日胜利后的四年时间，就建立了新的政权。“全盘西化”论也就销声匿迹了。

第二阶段的“全盘西化”论起自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此时虽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第 5 章，1934 年商务印书馆。
《独立评论》第 142 号。

没有胡适那样“国家级”的学者倡导和附和，但由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所捡起的 30 年代的这个论调 却又有其新的含义 在 30 年代，提倡“全盘西化”者，还都是以更新纯粹意义上的中国旧文化为宗旨的 而 80 年代的“全盘西化”论者 则不仅要更新传统的中国文化 更要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以取代现行的、初级的、尚需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此论公开发表的虽不多，但持续至今，那些转弯拐角提倡“私有化”者 依然是“全盘西化”论的延续。

这种自 80 年代以来兴其时的“全盘西化”之路 包括那种提倡“三百年殖民地”论的最激进分子 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题目下的“私有化”论者 实则都忽视了这样一个最简单 也是最必要的道理：中国是一个主体的存在，它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天依然存在 而且存在于包括“西化”了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中。谁也不能否掉这个存在。百余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论是英国人的鸦片 还是日本人的“三光政策”乃至苏联人的“无私援助”和武力威胁 美国人的金钱和资本 都未能“化”掉中国的主体存在。

中国人是向往先进文明的 他们绝非摒弃外国的先进。这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百余年来 外国先进的文明 不论是科学技术、生产力 还是管理机能和文化 乃至文学、艺术 中国的文明主体都是欢迎并努力接受的。但这种接受，并不是抛弃中国的主体性，更不是以简单的比较，就照搬西方的一切。

人类的共同性中 除对先进文明的趋同性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思维过程对特殊和一般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人的认识都是从特殊的、具体的事物开始的，由此事物到彼事物的认识，首先要经过比较 进而是归类、归纳、分析和综合 这一系列的思维过程所要揭示的，就是各特殊事物之间的一般性，认识也由具体上升到抽象。人类社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趋同性，是与对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一般性相统一的。一个国家之所以要向另一个国家学习，就在于对一般性的文明的趋同。如果没有一般性的认识，人

类就不可能相互交往，更不可能有对先进文明的趋同。从一般意义上对另外特殊国家的学习，并不是抛弃本国的特殊性，而是在坚持本国主体性的前提下，接受外国文明中的一般性的先进成份，以其引导对本国特殊矛盾的解决。显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将自己的特殊性换上别国的特殊性。

“全盘西化”论在其初次提出时 还具有这样的进步意义 即对当时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批判。但即令如此，此论依然有一个大的缺陷，就是对已经充分暴露其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加分析的接受，以及对 中国主体性的忽略。也正因此，其主张显出空想性而不可行。而此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先进文明，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演化出来的社会主义，并且注重了中国的主体性，以及社会主义一般性与中国特殊性的统一。这是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逻辑原因。而 80 年代以来的“全盘西化”论 不仅依然有 30 年代西化论者的缺陷，更忽视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运动的普及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的充分显现，社会主义原则已成为中国社会制度的内在因素。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的，并受传统的官文化和各种旧势力的抑制而有许多缺陷，但社会主义原则毕竟是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也是现代文明的最集中的代表。因此，否定社会主义，要退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能说不是历史的倒退，而且此路也是行不通的，是中国的现代文明主体所不能容许的。虽然并不排除在个别时期会出现一些偶然事件，但从总趋势上看，现时期“全盘西化”论的主张 注定是会落空的。中国的发展 必将与全世界共同的大趋势相一致，即在社会主义原则的指导下，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由此而实行现代化。

三、新思路——“现代化”的提出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科学范畴，自然是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在西方学者的现代化学说指导下，变革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发展生产力。这些观点是不能赞同的。中国的现代化其动因是内在的而不是外来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外来的影响，及对外国先进文明的学习和借鉴。落后并不可怕。正是处于落后境地，深受列强欺凌，而且不甘心落后，立志振兴中华的中国知识分子，才首先意识到，并提出了“现代化”这一论题，并初步形成了相应的范畴。这一点，在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中，已初显端倪，进而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又有进一步发展。到本世纪 30 年代，则明确提出了“现代化”这一范畴，并将“中国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目标。

“现代化”这一术语，最先出现于 1933 年 7 月的《申报月刊》上，该刊为纪念创刊周年，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现代化”由此而作为一个问题和范畴提出。其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如何沿着“现代化”的方向来变革和发展。该刊编者倡议就“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申报月刊》的这个特辑及其倡议，是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意识的集中体现。而“现代化”作为概括性的社会问题，不仅关系着对现在的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又关系对历史传统的批判分析，关系对未来趋向的探求，因此很快得到多方响应。

《申报月刊》的这一特辑，共发表 26 篇论文，重点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实现中国现代化需要几个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的方式，是社会主义的，还是个人主义的；是由外国资本促成，还是靠国资本自发的现代化，以及其各自的步骤。虽然所论观点五花八门，且都不很深入、系统，但有一

点却是共识，即中国要自立于当代世界，必须富强繁荣，而这唯一的方向就是现代化。

继《申报月刊》的这次讨论之后，1935年，中国学术界又展开了一场规模颇大的关于“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的论战，从而将现代化的探讨进一步引向深入。

这是一场涉及中国命运而且颇具普遍性的大论战。当时学术界的大多数名人如张东荪、陈立夫、叶青、张申府等都纷纷发表议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要坚持“中国文化本位建设”还是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这个论争道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然而这两种论点，都不足以说明中国社会矛盾的实质，而且显得相当空泛。其论断都很肤浅，也是行不通的。两派论争的结果，大有趋同性：不论是中国本位论者，还是西化论的主张者，都在相互的指责和诘难中意识到自己论点的偏颇。先是胡适提出“充分世界化”这一过渡性术语进而基本上同意用《申报月刊》讨论中提出的“现代化”这一提法。讨论的后期参论的文章大多以“现代化”为题了。

张熙若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也是有代表性的看法：

西化差不多是抄袭西洋的现成办法，有的加以变通，有的不加变通。现代化有两种：一种是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知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例如将中国古文加以句读，注意是加句读不是加新式标点，因为新式标点是不太适用于中国古文的），或将古文译为白话文（也不是定要欧化文体）；另一种是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用化的事情予以合理化或适用化（例如许多社会制度的应用和改良）。^①他还从四个方面规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一、发展自然科

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国闻周报》第12卷第23期。

学 二、促进工业发展 三、提倡各种现代学术 四、思想方面的现代化。他认为 由此而规定的“现代化”是中国的必然出路和富强的途径。

从“合理化或适用化”角度来规定现代化 虽说在当时还不可能深入，但张熙若的这一思路，却是比较准确的，从而也使“现代化”初具概念的形式。

到 40 年代初，冯友兰又进一步从概念上对现代化做了规定：

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专是名词上改变 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的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 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 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是中古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即专就名词说 近代化或现代化之文化 比西洋之名 实亦较不含混。

总之 经过这次“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战 早在 30 年代初提出的“现代化”已经做为一个公认的概念普遍应用于中国的思想界。虽说使用此概念者对其规定不尽相同，但它却已植生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中。在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中，既有以欧美资本主义为目标者，亦有以苏联社会主义为目标者。此外，在实行的途径上，有先农业后工业派，还有先工业后农业派。诸多论点 相互辩驳 足见当时中国思想界对此之关注。

而在西方国家，“现代化”作为一个概念提出 是在二战以后，其明确规定 则是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

我们说中国人首先提出现代化，绝不因此就认为有一种什么优越感。相反，正是中国的落后与被压迫的现实，才迫使中国的先

进分子不得不认真思考中国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前途。“现代化”在中国是被压、被挤出来的思想，它是中国文明主体自强不息、奋发图强意识的集中体现。虽说这初步的现代化概念还不可能成熟，其具体的设想还显得空泛，但它毕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智慧的结晶。而当毛泽东以他的创造性思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指导中国革命逐步取得胜利，最终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关键的一步。也正因此，新中国的政权，明确地将“中国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政治口号，作为全民族的奋斗目标。⁴⁰ 十余年来，中国的文明主体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奋进，取得了突出成果，但同时也走了许多弯路，遇到了诸多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在现代化的理论认识上，越来越深入和明确；我们在现代化的实践中，也越来越充满信心。克服困难，尽可能地避免弯路，是我们继续现代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主要任务。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现代化，是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在现时代共同的发展趋向。前面我们提到的有关学者对现代化的认识，一方面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觉悟，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在官方许可范围活动的知识分子所发议论的空泛性。他们虽然可以意识到现代化的大趋势，但对于如何实践中国的现代化，却又有一筹莫展之感。而当他们把“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于连他们自己都觉得靠不住的官僚政府时，另外一些不为政府所容许，并以“非法”方式从事活动的知识分子们，却开始了其实实在在的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作为中国文明主体的代表，他们敏锐地、深刻地意识到世界进步的大趋势，认识到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统一，并在这个意义上发动民众，

进行变革中国的斗争。

人类社会总体的变革是以近、现代的分野为重要阶段的。近代资本制度的矛盾演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其极端。资本从其物的存在形式来说，不过是极普通的各种生产物；从其价值形式来说，也无非是劳动所创造的，并体现于各种商品中的交换价值，而且通常以钱——货币表现并计算着。资本的这些性质，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论证了，但他们没能论证，并一直疑惑着他们的，是资本的社会性质，即资本又是一种社会关系，它集中体现着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这种性质，是由马克思所揭示并论证的。从这层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资本制度内含着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它一方面以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资本的所有者，想方设法为资本的增殖而竞争，而“铁面无私”地剥夺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从而促进了科学技术、生产力和管理机能的发展，同时引发价值观、思想和道德的转变，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资本制度又造成劳动的异化，并由此引起整个社会关系，乃至人类的存在异化，文明主体不是在自主、自觉的前提下，自由地发展文明，而是被迫地，但为了谋生不得不进行的劳动。这样，资本制度通过它对文明主体的统治，与其对文明发展成果的直接控制相统一，为了资本的增殖，它能在一定限度内促进文明的发展。然而，正是由于以资本增殖为目的，也就必然限制文明的演化方向，那些虽有利于人类福祉，但不能带来利润，或者利润率低的文明事业，得不到发展，而那些对人类利益不大，甚至有害的行业，如军事工业、毒品等，却因其有大利润，畸形地发展着。与此同时，资本制度还极大地限制了文明主体发展文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被迫进行劳作，并且得不到自己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所有权，文明成果反过来又会成为统治、剥削文明主体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文明发展的被压抑是可想而知的。

资本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对于突破封建制度，发达近

代文明，起到了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无限的，当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资本制度的障碍作用也就日益明显，到此时，唯有变革它，才能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一个合适的社会条件。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这种必然性，而且明确论证文明在生产社会化的促动下，所要求的社会制度和结构，是社会主义。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认为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提出的学说，既有其科学性，也有其超前性，它不仅适应于对近代工人运动的指导，也对现代社会矛盾的认识和解决具有启示和指导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近现代的最初分野，它是近代资本制度与文明发展矛盾的集中表现，随之而来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可以说是这种矛盾的产物。而资本制度与文明发展间矛盾的更突出的表现，则是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和随后进行的更大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及毛泽东以其创造性思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思路，并领导中国革命，也正是在这种世界大环境和过程中进行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必然出现的先进文明的集中体现，是文明主体利益和意志的集合。一些持“过时论”的人，常以“马克思是上个世纪的人，他的学说只适合于19世纪。在20世纪，尤其是快进入21世纪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用了”为主要论据。这种似是而非的议论之所以出现，就在于忽略了时代与时间的关系。时代当然是以时间为基础的，但时间的单位（年、世纪等）并不等于时代。时代是社会矛盾演进的阶段，不同时代的时间长度是不一样的，有的长达十几个或更多世纪，有的只是两、三个世纪。时代的划分，取决于文明、文明主体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是近代资本社会矛盾的产物，他从分析这种矛盾入手，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论证了资本制度发生、发展、灭亡的必然趋势，以及取代资本制度的社会制度及其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当

然 在马克思的著述中 也有相当多的关于当时世界经济、政治矛盾的具体论断。这些论断是具有时间性的 但其中所体现的一般性因素 却可以经过我们的发掘 而对现代的研究有所启示。对于现代的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其基本观点、方法论和原则，这是在分析近代资本社会矛盾中形成的，也是近代文明先进因素的体现。这些内容 对于我们分析现代社会的矛盾 尤其是分析依然存在的资本制度与现代文明的矛盾，探讨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都有其指导意义。这种指导意义 还由于马克思的立场 即以高度自觉的理性站在无产阶级 即文明主体的骨干的立场上 而具有其长久的连续性。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指导意义。

第二，世界现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容许中国再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中国的古代 商品交换曾经相当发达 但由于官僚政治制度的限制，未能演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这方面 中国几乎落后于西欧一个时代。而当中国的先进分子觉悟 并学习西方的文明以求进步时，世界的大趋势已是资本制度开始没落 并明显地障碍现代文明发展的时期了。在这种条件下 依然还沿西方国家的老路走 不仅是落后的 而且是真正“过时的”。走西方国家三、四百年前走过的老路 是不可能掌握并运用现代先进文明的，唯一可行的，就是在先进文明集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依靠中国的文明主体，探索并开创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而那些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容许中国自主地发展自己的资本制度 它们力求保持中国的官僚政治 以巩固其对中国资源和劳动力的剥夺。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

第三，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中国的知识分子 在接受西方的社会科学时 曾有一种简单的认识 即将其社会科学的学说视为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相等同的